

【外交关系】

“全球南方”框架下的 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

门洪华 俞燕芳

【摘要】“全球南方”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其独立的政治立场给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深刻影响。中国有必要理性认识“全球南方”对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再定位的影响并适时进行外交政策调整。“全球南方”崛起是百年变局的重要变量,应在中国外交战略设计中突出其关键性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紧紧围绕“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为指引,以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扩大个体情感认同为路径,通过合作平台的搭建与全球治理机制的重塑,积极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深入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的脆弱性与内部博弈、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的拉拢和分化,使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面临诸多挑战。面向未来,中国应继续以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引领“全球南方”合作、落实好中国三大全球倡议,统筹国家、地区与全球布局,构建起以点带面、聚面成网的机制体系,形成政治、经贸、安全、人文等多轮驱动的复合型结构,实现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大国担当;理念创新;制度化合作

【作者简介】门洪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俞燕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92)。

【原文出处】《国际观察》(沪),2024.1.67~94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引发全球力量重组,引领着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展现出重大的战略价值。“全球南方”引起世界主要大国广泛关注。西方加速对“全球南方”的拉拢与分化,印度积极争夺“全球南方”领导权,其共同点均是在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同时试图将中国排除出“全球南方”之列。与此同时,中国与少数南方国家在“全球南方”议题上也面临着认同挑战。如何正确认识“全球南方”,如何客观看待中国与其关系发展取得的成就与不足,如何在大变局中以自身发展进一步引领“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共同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一贯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超越“南北二分法”,在更高层次、更多议题、更广主体中重新思考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国以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和担当创新理念指引,深化制度化合作,强化了和平发展的价值内涵、利益基础与情感认同,形成了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共同崛起的系统化、立体化路径。国内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学术成果丰富,如探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历程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模式的转变;^①聚焦双方区域合作的发展,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非关系演变、中拉关系的发展等。^②同时,国内学界关于“全球南方”研究集中于近两年,主要从世界格局演变与世界秩序重组的视角解释“全球南方”崛起的意义。^③

但相关研究对于“全球南方”、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互动考察略显不足。相较而言,国外学界关于“全球南方”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从2000年开始,西方对“全球南方”的学术探讨快速增加,主题涉及以“全球南方”视角看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欠发达地区,关注非传统安全议题,深入探讨国际关系理论非西方化。^④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认知有一定偏差,对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国家整体关系论述不足,理论建构与实践议题均有待拓展。

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总结“全球南方”崛起如何赋予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新的内涵,探讨中国如何设计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实现“全球南方”的联合自强。本文的主要内容是:梳理“全球南方”崛起的根源、表现和效应,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变化与面临的挑战,探讨中国如何进一步引领“全球南方”发展。

一、“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效应

1969年,美国作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率先使用“全球南方”一词,他认为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产生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⑤此时正值民族解放运动和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兴起之际,政治斗争被认为是处理南北问题的适当手段,^⑥“全球南方”也被赋予了反殖民统治的政治色彩。20世纪70年代,“全球南方”作为“第三世界”的同义词,用来描述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1980年,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发布《勃兰特报告》(Brandt Report),倡导以超越地理界限的视角看待“全球南方”,视“全球南方”为一个发展的概念。^⑦1987年,南方委员会(South Commission)成立,致力于通过推动南南合作、协调南北对话来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发展。然而,石油危机、破坏性贷款条件和西方国家持续阻挠,使“全球南方”的行动仅仅被视为象征性议程,^⑧“全球南方”的发展在

20世纪80年代陷入倒退。

冷战结束后“全球南方”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与中国“三个世界”理论的划分方式不同,西方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划分冷战时期的“三个世界”,认为美欧资本主义国家属于“第一世界”,苏联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属于“第二世界”。^⑨随着苏联的解体和“第二世界”的消失,“第三世界”的概念受到质疑。另一方面,西方语境中的“第三世界”常常与贫困、肮脏、不稳定联系在一起,这种叙述方式受到批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气候变化、疾病传播、粮食安全等新的挑战相继出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认识到不可信赖和依赖北方的支持与援助,南方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⑩国际社会亟需一个恰当概念来规划冷战后新的地缘政治安排,故而“全球南方”顺势推出。200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建立“全球南方”的倡议,呼吁让南方国家掌握自己的未来。“全球南方”不再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同义词,而是作为反映经济社会变革与地缘政治进程的概念出现。

目前学术界未形成关于“全球南方”的统一定义。有学者认为,“全球南方”是一个后殖民国际利益共同体,希望通过国际团结实现平等与自由发展。^⑪有的学者则赋予“全球南方”在空间、经济 and 认同领域的三层含义。^⑫本文认为,首先,“全球南方”是指经济欠发达、失业率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国家和地区。随着生产过程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和资本主义内部扩张对剩余价值的进一步榨取,导致发达经济体内部产生分化,致使“全球南方”超越国家地理界线,不仅包括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还包括以剥削、压迫和新殖民关系为特征的发达国家的内部空间。^⑬其次,“全球南方”涉及共同身份,是具有面临相似挑战和社会现状的群体。艾尔弗雷德·洛佩斯(Alfred J. López)将其描述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的边缘,世界底层人民对他们共同处境的相互认

可”。^⑩相似的殖民历史、发展水平以及对秩序的共同意愿是“全球南方”认同感的来源。其三,“全球南方”是一个更为务实和中立的概念。与之前强调“第三世界”这一概念的政治属性和与西方的对抗性不同,“全球南方”是在现代化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更加强调发展的重要性。^⑪“全球南方”正在构筑以结果为导向的经济外交叙事框架,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其四,“全球南方”是一个多元群体。“全球南方”的行为主体不局限于政府,还包括区域组织、民间社会、私营部门等,目标是实现发展受限的国家、地区和社群独立自主的发展。^⑫

(一)“全球南方”崛起的渊源

“全球南方”崛起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逐利是资本的天性,为获取更多利润,资产阶级必须寻求更大的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⑬二战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全球扩张以殖民掠夺的方式展开,导致了殖民地的落后和贫困化。二战动摇了殖民体系的根基,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部分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建立本国经济体系。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推行为其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依旧面临来自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政治控制、军事威胁和文化渗透,联合自强势在必行。1955年亚非会议进一步鼓舞了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随后的不结盟运动支持各国团结一致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推动第三世界逐渐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力量。七十七国集团的成立与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合作、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依托。随着20世纪7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第三世界的诉求由反帝反殖民转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全球南方”正是在此背景下被提了出来。

与此同时,西方更加注重优化资本管理、利用技术手段降低生产成本,在推动全球经济体系发展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和深化全球经济关系。“全球南方”崛起是生产力发展维度下对生产关系提出新需求的表现。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散,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重置。作为承接生产要素转移的对象,“全球南方”凭借其巨大市场、低生产成本及由此带来的高额利润吸引了大量投资,以弥补国内生产要素缺口、推动经济增长。对现代科学知识的吸收与应用,以及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制度安排的传播,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南方”的经济实力,进而推动了国际政治权力演变。

为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避免资本无序扩张的“反噬”,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进行约束和调控。^⑭这一体系以其相对开放性和制度性将“全球南方”纳入其中,为“全球南方”获取生产资料打开了渠道,提供了关键公共产品。从冷战结束到20世纪末,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发展与红利分享时期,^⑮“全球南方”得以实现经济增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全球南方”的加速崛起提供了新的机遇。基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被迫接受附加条件的教训,“全球南方”实行储备积累政策,在加强自我保护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一方面,国际经济体系已经无法反映出“全球南方”日益增长的实力,这些国家对秩序变革有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此次危机预示着美国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逐渐式微,“全球南方”利用美国的战略收缩顺势提出更多全球治理方案,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化。

“全球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实力不断增强,但现存国际体系并不能反映“全球南方”的权力结构、利益所在和价值观念,“全球南方”崛起

受到结构性制约。“全球南方”面临的问题包括现代产业占比和生产性投资较低,经济适应能力相对较低,政治民主化程度不高。因此,“全球南方”迫切要求提高发展水平,以整体力量突破现行生产关系等体系桎梏,掌握先进生产资料的主动权,通过独立自主和团结合作解决国家难题,推动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民生发展进步。

(二)“全球南方”崛起的主要表现

生产力的发展使世界力量重心日益向南方倾斜,“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西方发展模式和现行世界秩序的弊端,“全球南方”顺势而兴。“全球南方”国家实力不断提升,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势不可挡。

其一,“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1年至2022年,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从78.85%下降至41.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从21.15%上升到58.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6.1%。^①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逐渐成为跨大陆的南南贸易和投资的中心。“全球南方”展现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意愿和实力。

其二,“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性上升,其政治立场对国际关系调整产生了深度影响。乌克兰危机让国际社会认识到西方社会追求绝对安全的做法只会导致更多冲突,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讨论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决议时,印度、巴西、南非等“全球南方”国家明确表示不支持制裁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中,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同样未选择制裁俄罗斯,一些国家甚至增加了对俄贸易。2022年俄罗斯与印度的贸易额增长了205%,与土耳其的贸易额增长了87%,与阿联酋的贸易额增长了68%,极大

地削弱了美西方对俄的制裁效果。在2023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对巴以局势决议草案的投票中,中国、巴西、阿尔巴尼亚等南方国家纷纷支持停火止战,并敦促各方遵守国际法。虽然该草案被美国否决,但“全球南方”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开始根据本国利益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活动,在大国间寻求构建灵活、平等的关系。“全球南方”对西方依附度下降打破了西方国家凭自己意愿主导世界事务的局面,西方国家意识到必须正视“全球南方”的诉求并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

其三,“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塑造新格局的重要力量,在推进全球治理多元化与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南方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积极扮演建设性角色,致力于引领全球治理和塑造世界秩序。“全球南方”在联合国、七十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等全球治理平台上积极发声,在解决地区与全球热点问题、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缓解粮食与能源安全困境等方面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通过东盟、非盟、金砖国家峰会等区域性合作机制,“全球南方”积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成为百年变局深化演进的关键支撑。

其四,“全球南方”正成为世界政治中新的战略资源。^②主要大国加紧布局“全球南方”,希望增强对“全球南方”的政治掌控力。^③七国集团广岛峰会联合声明提出,要深化与“全球南方”的伙伴关系,与“全球南方”在清洁能源、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等方面扩大合作。^④欧洲国家表示要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合作符合欧洲的战略利益,2023慕尼黑安全会议专门设置南北合作议程,强调要争取“全球南方”。^⑤日本2023年《外交蓝皮书》突出“全球南方”一词,指出要全力推介“全球南方”,为日本拓展活动空间。印

度举办“全球南方国家之声”(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线上峰会,宣称“全球南方”时代正在到来,毫不掩饰其领导“全球南方”的意图。^⑤“全球南方”已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声音,成为应对治理危机的新平台。

(三)“全球南方”崛起的效应

“全球南方”现代化与工业化发展使数十亿人融入世界经济进程,多极增长趋势愈发明显。新的一体化模式将区域集约化与全球开放相结合,“全球南方”在提供稳定市场、提供国际援助和外资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危机、制度危机、文明危机重叠的情况下,^⑥“全球南方”能够以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的能动性视角,为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负面影响提供方案,使“发展才是最终目标”成为全球共识。

“全球南方”的历史性进步为其重塑全球地缘政治创造了机会,以欧美为主导核心的等级制国际体系正在让位于多元化的世界体系。南方国家希望在现有组织机制框架内重新分配世界权力,它们认为国际秩序的规则应由所有国家民主决定,并建立在南北国家团结的基础上。“全球南方”的主张有力地冲击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全球地缘政治中心东移趋势愈发明显,去中心化与多极化的新世界格局正在加速塑造。

“全球南方”的崛起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抗帝国全球化和全球殖民主义的基本诉求。重建“全球南方”在世界秩序中的定位是在以美国为基础的新帝国全球化形式和以新兴经济体为基础的反霸权全球化形式并进中发生的,^⑦因此“全球南方”发展是全球权力关系与全球规则重组的一个步骤。^⑧在利益和历史认同感的驱动下,“全球南方”内部综合实力较强国家对较弱国家提供多种形式的投资与援助。“全球南方”通过这种形式的团结互助抵抗全球殖民主义,将自身从不平等交换体系中解放出来,强有力地

传递出这样的信号,即世界体系内的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团结互助实现发展,“弱者”也可以推动世界秩序发生改变。

二、“全球南方”背景下的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特征

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是“全球南方”关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反映了“全球南方”崛起的特征与效应,突出体现了“全球南方”对发展的诉求。“全球南方”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关注议题更全面,对各议题领域进行了广泛、系统探索;涉及对象更多元,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给予高度关切;外交结构更系统,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外交符合“全球南方”抱团取暖的特征;关系模式更中立,伙伴关系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对战略自主性的要求;双向互动更积极,“全球南方”作为百年变局最大变量的影响力正充分发挥。最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主线,双方以生产力发展目标替代资本利润目标,追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充分展现大国担当,以超越资本逻辑的视角对生产方式进行改革,构建起“全球南方”发展需要的客观环境、发展路径和价值共识,在帮助“全球南方”发展的同时凭借自身实力与影响力使“北方”更重视这些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一)中国身份定位发生变化,大国意识和大国担当更加凸显

中国始终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呼吁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国际统一战线。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理念,成为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方针。随着中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构想,^⑨致力于增强与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协作。1974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个世界”“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坚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同盟军地位。中国的

主张契合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双方以反帝反殖为共同目标开展合作。邓小平在正确把握时代主题基础上提出“东西南北”问题,强调“南南合作”的重要性,^⑧明确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方向与路径。江泽民、胡锦涛聚焦发展,提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合作观”和“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双方友好关系。^⑨高质量发展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南方”的核心要求。在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中,与西方对抗的色彩淡化,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出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是百年变局中最大变化的判断,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外交战略重点的地位更加突出。中国相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等新理念新倡议,以负责任的大国担当,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支持汇聚南南合作的力量,通过合作平台的搭建与全球治理机制的重塑,与发展中国家在双边、地区/次地区和全球层面开展深入合作;依托多年发展形成的知识盈余,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经验分享。究其原因,“全球南方”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发展中国家从被动接受现行秩序到主动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对中国外交议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发达国家践行单边主义、构筑遏制中国的联盟,中国崛起更需要南方国家的支持。“全球南方”认识到,要在全球事务中拥有更大话语权,同样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在共同愿景的引导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入全面发展和密切时期。

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⑩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这一立场,以回应部分国家对中国身份的质疑。另一方面,中国越来越展现出大局意识和大国担当。^⑪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欢迎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引下,中国在区域与全球层次供给了诸多新型

公共产品,既包括对传统发展类公共产品、规则类公共产品、价值类公共产品与安全类公共产品进行升级,更包括自主创设的新平台、新机制。^⑫中国密切关照“全球南方”的发展需求,积极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这是中国从实现自身发展到引领“全球南方”发展进而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必经之路。

(二)创新理念指引,丰富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价值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形成了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为抓手,以正确义利观为道德底色的创新性方案,赋予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新的价值内涵。

其一,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总体规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升华了中国对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体现出对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强烈追求。作为“全球南方”一种新的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其合作共赢的利益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共建共享的治理观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准则,为“全球南方”合作共生、共赢共享提供了顶层设计。

其次,将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为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中国致力于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其中相互尊重以平等交往的政治内涵成为国家交往的基础,公平正义以良性互动的伦理思考成为国家交往的保障,合作共赢以互利互惠的发展逻辑成为国家交往的目标。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其本质是顺应世界潮流,摒弃零和博弈思维,以开放包容的建设性路径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以协调合作的建设性方式促进国际关系的优化。^⑬新型国际关系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兼具可行性和吸引力的方案。

其三,秉持正确义利观,作为中国—发展中国家

关系的道义指向。正确义利观意味着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树立义利兼顾、弘义融利的责任观,摒弃丛林法则、超越零和博弈,做到取利有道;意味着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权力观,反对强权政治与恃强凌弱,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意味着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贯彻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发展观,关切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实现共同发展。

(三)升级伙伴关系模式,深化中国—发展中国家制度化合作

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内涵。^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要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重心已经从规模扩展变成提高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韧性,以实现世界秩序的整体塑造。

双边关系建设是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基础。从战略伙伴关系与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形成了一套纵向的伙伴外交体系,凸显了中国的价值取向。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蒙古、古巴、南非、越南等国建立双边命运共同体,伙伴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全球伙伴关系的升级扩大了中国外交政策空间,契合了“全球南方”追求战略自主的政治愿望,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

多边关系的拓展与制度化合作的深化与推进,是中国全球伙伴关系多边主义转向的重要保障。在地区层面,中国以“1+X 合作框架”建设、分论坛设置等方式推动地区合作论坛进一步完善,夯实地区合作基础,回应“全球南方”通过机制化平台建设整合内部力量的需求。中国和东盟于2017年形成了以政

治安全、经贸、人文交流三大支柱为主线、以多领域合作为支撑的“3+X 合作框架”,^⑥加速了“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发展规划对接。中国和非洲于2018年就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同非盟《2063 年议程》、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的平台作用达成一致,并在2021年以包括卫生健康、减贫惠农、贸易、投资、数字创新、绿色发展、能力建设、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在内的“九项工程”为论坛注入新动力。^⑦中国和中东国家通过中阿能源合作大会、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中阿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等分论坛形式,为中阿合作开辟更广阔前景。中国和拉美国家于2018年就通过中拉论坛将“一带一路”全面延伸至加勒比地区达成共识,又于2021年通过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巩固中拉论坛作为中拉整体合作的主要平台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动与地区组织伙伴关系的转型升级。2021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深化为有意义、实质性、互利的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⑧伙伴关系的深化成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2015年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双方以国家宣言的形式正式将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写进合作纲领,中非务实合作全面加强。2018年中阿关系扩展为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⑨2022年升级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阿合作被推到一个全新高度。中拉关系进入有史以来的最佳时期,^⑩2014年中拉命运共同体宣布成立,2022年中国倡导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为契机深化中拉关系,为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增加新的时代内涵。

在跨区域层面,中国加速搭建或构筑跨洲合作平台,完善立体化区域布局,回应“全球南方”设置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国际议程,进而扩大在国际事务

中话语权的诉求。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探索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建构路径。2018年,中国将其升级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各国在全球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高起点合作。^②迄今,中国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超过200份合作文件,蒙内铁路、印尼雅万高铁等重要项目建成运营,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贸易资金流动、人文交流畅通了渠道。作为第一个横跨亚欧非的开放性合作架构,“一带一路”开创了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新模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

(四)扩大主体覆盖,发展中国家彼此关切每个个体的发展

“全球南方”是一个涵盖政府、民间组织和个人等的多元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以人类为单元的世界观,关注每个个体的发展。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③契合了“全球南方”广泛的主体关切。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更加关注非政府主体的发展诉求。

对外援助是中国与非政府主体互动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从主要做受援国政府工作转向政府与非政府并重,注重受援国社会和民众的需求。中国在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④2018年中国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更综合、有效的方式对外提供援助。2022年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下设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并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专项资金金额达40亿美元。基金成立以来,在亚非拉50多个发展中国家实施了130多个项目,惠及2000多万民众。^⑤“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以人道主义援助、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卫生健康、扶贫、可持续工业发展、贸易促进等为优先领域,主要关注小微民生项目的实施。中国对外援助将保

障人民生存权作为根本出发点,努力回应每个个体的正当权益诉求。这种特色援助模式与“全球南方”发展合作主流模式正在加速融合,对非国家行为体权益的关注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互动的一大特征。

在百年变局下,中国崛起需要“全球南方”更坚定的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也需要中国发挥更积极的引领作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指引下,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以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和担当引领“全球南方”发展,以深化制度化合作布局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扩大个体关切提升中国和平崛起的情感认同。概言之,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彼此崛起过程中的坚定支持力量。

三、“全球南方”背景下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面临的挑战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越来越密切,双方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越来越强,但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推进也面临诸多挑战。

(一)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受到印度等“全球南方”大国的质疑

2023年1月12日至13日,印度举办“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邀请超过120个发展中国家参加,但是中国不在邀请之列。印度的理由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传统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科技创新能力也在全球领先。^⑥在中印地缘政治博弈日益激烈之际,印度此举旨在分化中国与“全球南方”,影响“全球南方”对中国崛起的支持。墨西哥曾在WTO谈判中反对将中国纳入发展中国家行列,理由是中国具备了较强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应再被当作发展中国家对待。^⑦墨西哥此举旨在使本国在世贸组织内获得更多发展援助和特殊待遇。印尼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技术进步和全球影响力已经不符合发展

中国家的特征,呼吁在国际框架内重新评估中国的国家分类。^⑧

(二)“全球南方”大分化、大改组呈加速态势,内部竞争削弱了“全球南方”对中国崛起的支持

发展中大国尤其印度对“全球南方”主导权地位的争夺使“全球南方”内部分歧愈发难以调和。印度渴望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将自己打造成领导型大国,^⑨试图以“西南大国”的身份定位充当南北桥梁,两头取利。^⑩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广泛地扩展到南亚和印度洋地区,^⑪印度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敌视不断上升。^⑫为了在与中国竞争中获取优势,印度干预印度洋国家亲华政策,抹黑中国在本地区推进的“一带一路”项目,并出台多个替代性地区基建方案(如“孟不印尼经济走廊”“印缅泰经济走廊”等)。在多边舞台上,印度影射中国搞“扩张主义”,^⑬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战略联动,构建对冲联盟以牵制中国崛起。另外,巴西、南非、土耳其等新兴国家也均有自身独立的政治和经济议程,其扩大自身影响力时亦有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发生。

发展中国家政权变化和更迭增加了某些国家政策的摇摆性,在此情况下“全球南方”更难达成内部一致。譬如,拉美国家正处于政治变动过程中,右翼政府通常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向美国靠拢,在人权问题上追随美国,批评中拉关系已经呈现出“南北关系”的特征。^⑭拉美左翼政府相较之下则突出追求自主外交,对中国态度较为友好。拉美国家多政权形态共存与快速更迭,影响其对国际关系的态度,一些国家容易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出现投机行为,使中拉关系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更关键的是,“全球南方”并未出现规则健全、目标明确的协调机制和行动纲领,类似“万隆精神”的普遍价值观的缺失致使“全球南方”自我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感并不强烈。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联盟活力消退,甚至陷入内部分歧,^⑮

“全球南方”也没有展现出强大凝聚力。利益分歧、权力争夺、核心价值观缺失使“全球南方”难以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削弱了“用一个声音讲话”的力量。

(三)“全球南方”自身的脆弱性在全球化时代越发凸显,导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成本增加、合作空间被挤压等问题更加明显

供给侧冲击、乌克兰危机、消费者与投资者信心减弱等导致全球经济放缓,引发通胀压力和金融动荡,许多国家发展停滞,发展中国家受影响尤大。大国博弈、地缘竞争加剧和传统安全回归等因素不时破坏全球发展治理的大环境,进一步削弱了“全球南方”发展的动能。^⑯加之多数南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相对薄弱,南北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发展差距和不对称相互依赖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结构上的突破。复杂的国际局势、殖民历史造就的落后与路径依赖暴露了“全球南方”发展的脆弱性,更有可能激发部分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使其在处理与中国经贸关系问题时态度更加强硬,相关国家官方与民间层面容易出现涉华负面声音,既妨碍了合作的深入推进,又为一些别有用心国家提供了外交议价的机会。^⑰这于中国而言,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外交成本维护双边关系。

非洲、拉丁美洲与中东地区的脆弱性与复杂性使中国推进与其整体外交面临各种因素的阻碍。非洲和拉美长期受到帝国掠夺性发展的影响,中国作为发展伙伴的道义责任和压力相应增加,不得不对双方合作模式进行调试,^⑱在相对落后的环境中进行大量投资,增加了双方合作成本。与此同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对非洲和拉美现代化产生了持续性影响,它们对前宗主国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路径依赖。由此,中国与非洲和拉美的合作依旧面临来自前宗主国遗留模式的竞争,这无疑影响着中国对非洲和拉美的政策空间。此外,

非洲和拉美地区内相关组织和机制数量众多且彼此重叠,不同合作机制之间缺乏协调,中非合作和中拉合作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凸显。由于非洲地区现有非洲—欧洲首脑会议、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和经济合作论坛、英国非洲事务委员会、法非峰会、日非经济合作、美洲—非洲领导人峰会、阿拉伯—非洲峰会等大量合作机制存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拉美地区也存在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经济合作论坛、欧盟—拉美加勒比共同体峰会、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等机制平台,各方从各自利益出发推动双边合作。上述机制与中非、中拉合作并不协调,甚至相互竞争,阻碍了中国与非洲和拉美合作成果的有效落实,成为阻碍中非、中拉深化合作的因素之一。

中东地区的地区一体化发展较为滞后。^⑨一方面,海湾合作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地区组织并没有能力提供地区公共产品,中阿合作论坛建设亦尚不成熟,距离全面合作尚有差距。^⑩另一方面,在中东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伊朗与海合会、逊尼派与什叶派、君主制与共和制、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矛盾复杂而相互叠加。^⑪种种因素致使中东经常陷入冲突和战争,传统的地区规范和制度受到严重冲击,政治力量去中心化、多极化和分散化趋势明显。^⑫在中东地区既没有具有信服力和领导能力的地区领袖,缺乏有效的一体化推动力量,又常陷入战争状态的情况下,中阿合作关系的建设缺少可以倚重的核心国家和地区合作机制,为中东地区的“搅局者”“迎合者”提供了明显的机会主义空间。^⑬中阿关系的整体推进更为困难,已经达成的合作成果也面临夭折的风险。

(四)西方国家在“全球南方”内部制造对立,通过制造矛盾试图使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相互钳制的局面

在西方话语与价值观的影响下,“全球南方”甚

至可能成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力量。西方国家制造矛盾的手段之一是鼓噪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将中国列为发达国家,试图制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对立。美国两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议案》(PRC Is Not A Developing Country Act),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被视为发达国家。欧盟基于近年来中国高端技术产品竞争力增强的现象,认为中国再也不能被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全球重要的行动者和领先的技术力量。欧美希望以这种方式分化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认同共识。西方国家制造矛盾的手段之二是拉拢“全球南方”部分国家对中国形成战略遏制。美国拉拢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大国,不断挑唆、阻碍和撕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多边治理和全球化进程构成直接挑战和严重干扰。^⑭在经济上,美国力促亚太国家参与“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推动其配合对华“脱钩”,阻碍中国与周边国家推进经济合作。政治上,美国通过“印太战略”重构对华竞争态势,增加了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摇摆性,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造成冲击,部分国家放缓与中国互联互通的步伐,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持续动力和积极性受到影响。在安全上,通过介入和炒作使南海海洋权益争端、湄公河水资源等问题进一步升温,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关系更趋复杂化。西方国家制造矛盾的手段之三是利用官方身份或媒体舆论制造针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隔离,加深某些南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阻挠或破坏中国推动的务实合作。^⑮譬如,美国将中国在非洲推动合作的行动抹黑为“掠夺性的新殖民主义”(Predatory Neocolonialism),借新冠疫情大肆污名化中国。^⑯这些言行塑造了部分非洲民众对华负面认知。面对日益深化的中拉关系,美国调整战略打压拉美左翼政府,加大对中拉合作的干扰与破坏。^⑰西方的舆论攻势动摇

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互信基础,部分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有所抬头,^⑥对正常的国家间合作带来影响,阻碍了双方项目的落实与推进。在西方鼓动下肯尼亚单方面宣布终止与中国合作建设焦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机场项目,并要求中国支付43亿美元赔偿金。

综上所述,“全球南方”的脆弱性与内部分化使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面临诸多挑战,大国博弈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中美间的摇摆性。中国—发展中国家整体关系推进既有内部阻力,又面临外部干扰。

四、进一步引领“全球南方”发展的中国方略

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能够开发出更适合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和经济需求的技术,是潜在的发展资金来源,对弱小国家发展的带动性会更强;而中国变革秩序的努力带来的利益是普遍性的,意味着“全球南方”都能够共享秩序变革带来的好处;相似的被殖民经历又给这一关系增添了情感内涵。这些因素共同赋予中国引领“全球南方”发展的合法性与。面向未来,中国应该充分考虑“全球南方”发展现状,以更负责任的大国担当整合“全球南方”力量,推动中国崛起与“全球南方”共同发展。

(一)坚守发展中国家身份,坚定“全球南方”立场

中国既是“全球南方”的代表,也是“全球南方”发展的重要支持者。在“全球南方”大分化、大改组时期,部分国家试图剥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将中国排除出“全球南方”之列。对此,中国必须加以反对。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⑦王毅在第十三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表示,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⑧对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重申,既是为

了回应国际社会的质疑,也是为了深化与“全球南方”的情感联系,为中国崛起构筑牢固的国际政治基础。中国要坚定“全球南方”立场,坚持以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发挥引领作用,在更多领域、以更负责任的担当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进“全球南方”的联合与发展。这无疑将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内在紧密联系,并使其充分认识到将中国与“全球南方”分离将会极大削弱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俄乌冲突引发世界格局重塑之际,中国可顺势推出顺应“全球南方”诉求的发展构想,推动“全球南方+中美欧”格局的形成。

(二)坚定支持“全球南方”发展,在“全球南方”中积极落实中国重要倡议

聚焦全球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⑨为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提供了路径。在数字化时代,中国可以“区域数字合作”的形式整合本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重组产业链分工,助力“全球南方”进入智能化主导的工业4.0时代。“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弥合全球发展赤字提供的公共产品,要发挥“一带一路”在全球产业链构建中的枢纽作用,拓展海关、税收、数字信息等领域的规则协同,建立统一标准。加速第三方合作步伐,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在巩固传统互联互通的同时尝试网络和空间中的关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面对全球发展新态势,要开拓新兴合作领域,在现有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基础上探索在数字身份、数字金融工具、数字税收、全域支付等方面的产业交易链与监管框架,形成“发达国家技术+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国产能+国际标准”的全链条。

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契机,稳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多边安全制度保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安全机制,依托联合国、上合组织等既有机制在军备控制、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加强合作,构筑安全互助态势。创新地区和全球安全机制,如推动创立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灵活运用“建设性介入”政策,建立行之有效的冲突调解机制,推动危机驱动型治理模式向利益驱动型模式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安全机制应当与经济机制紧密联系和衔接,以安全的复合特征为切入,协同安全与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突出“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打造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位一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格局。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②在政府层面,发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带动作用,消除文明极差引起的交流混乱。创新开展“政党+”交往模式,通过不同政党对话、政党论坛及其下设工商界、智库、媒体等分论坛宣介全球文明倡议,深化与他国政党的理念交流与契合。在民间层面要综合运用现代传播手段,发挥全媒体平台作用,以文字、图像、音频等多种方式让世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

(三)按照双边、多边两轨并行的思路统筹国家、地区与全球布局

在充分了解地区差异和诉求的基础上,构建起以点带面、聚面成网的机制体系,增强双方关系的韧性和弹性,夯实中国—发展中国家整体关系的战略基础。在双边关系上,致力于以高层互访为引领,以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为依托,稳固共同利益认知,为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构筑坚实基础。如在处理中印关系时,要理性看待对方发展,坚持中印共同崛起的战略愿景,提升双边关系稳定性和成熟度。推进中印首脑互访、多边会晤等沟通渠道的机制化建设,落

实两国领导人战略共识,致力于在元首外交引领下,探索发展战略对接,增强两国的战略兼容,为中国崛起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再譬如与南非交往中,要完善中南双边联合工作机制,打造多层次、复合型和多样化协调机制,将中南合作纳入中非整体合作框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南非“法基萨”行动(Phakisa)和非洲大陆自贸区数字贸易走廊协调发展,推动中南关系在更高层级、更多议题、更大密度、更全规划上取得突破,为深化中非关系搭建桥梁。

在地区关系上,充分利用既有机制平台巩固合作成果,在兼顾制度建设与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嵌入非传统安全新议程,在扩大共同利益与人文交流的过程中实现多领域合作良性互构,通过长效机制推进和战略机制对接增强中国与不同地区合作的内聚力。在周边地区,依托“10+1”框架推进可持续发展,并以“10+1”建设为核心整合不同地区合作机制与国家战略,有序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经济走廊发展规划。继续维护好区域机制的“东盟中心”,促成“南海行为准则”早日落地。在地区和平与东盟主导的基础上,顺势推进“一带一路”和柬埔寨“四角战略”、越南“两廊一圈”、太平洋岛国“蓝色太平洋”等构想的有效整合,为地区规范共识的达成创造条件。在中非关系上,以发展走廊为突破口加强“一带一路”与非盟“2063年议程”(African Union Agenda 2063)对接,以制造业、矿业、新能源为重点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与非洲工业化战略对接,以发展自我减贫能力为目标加强中国扶贫思想经验与非洲减贫计划对接。另一方面,以中非合作论坛为引领,利用非洲关注绿色经济、服务业、旅游业、城区改造的机遇推动中非合作论坛在民生项目上的建设,使中非合作直接惠及普通民众。中非合作论坛是新时代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一面旗帜,^③对中国与其他地区合作与制度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相关经验总结及其在“全球南方”的推广十分必要。巴以冲突、

叙利亚问题、宗教极端势力、域外大国在中东长期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等因素为中阿关系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中国要从“大中东”的地缘战略高度和全球治理的高度认识中东的重要性,增强中国对中东的影响和塑造能力。为挖掘中阿合作潜力,中国应当在对世界主要大国的中东政策、中东地区整体形势以及中国在中东具体目标与规划综合把握的基础上,形成涵盖整个中东的整体战略构想,以此为指导重新设计论坛机制的未来发展。可探索建立“金砖+东盟”“上合组织+海合会”“中国+东盟+非盟”等跨区域对话机制,^①在跨地区和全球治理框架下规划中阿合作的发展方向。近年来,美国对拉美地区分化与裂解效应显著,^②中国需要为中拉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活力,关键是引导中拉合作论坛由目前的“一对一”模式转向“一对多”发展,将中拉合作论坛与拉共体解绑,实现该论坛在各议题决策上的自主性和自决性。要重视中拉合作论坛与太平洋联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地区次区域组织的联动,^③确保区域、次区域的相互平衡。面对美国的压力,可通过构建三边智库对话机制、三方企业合作等拉美事务磋商平台,鼓励拉方发挥更加积极主动作用,努力消除战略误解和误判,形成均衡、稳定的中美拉三边关系。

在跨地区关系上,要在尊重地区差异的基础上,以多边主义的协商制度完善既有机制,塑造利益共生、责任共担、情感共融的跨地区互动关系。作为中国积极参与并逐步引领的跨地区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政治、安全、经济层面上弥补地区公共产品的不足,在推动不同地区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更好维护“全球南方”的利益,中国需要进一步规划相关组织和机制的前进方向。落实共同治理观,通过金砖国家关系的深化和扩容缓解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引发南北对立的质疑,^④提升金砖机制引领“全球南方”塑造国际格局的

效能。深化的重点在金砖国家伙伴关系,通过现有领导人会晤机制强化跨部门、跨领域合作。扩容的关键在于推动“金砖+”的发展以及与南方共同市场结构融合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协调,寻求与关键地区联盟的利益汇合点,减少跨地区机制的重叠和功能冲突。落实共同安全观,巩固上合组织维护地区安全的作用并外溢至其他领域。对内,深化信息交流和联合行动能力,加强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的协调,^⑤夯实组织职能基础。同时探索构建地区金融体系,提供更多地区公共产品,尽可能满足中小成员国的利益需要,以此提高上合组织的凝聚力。对外,进一步加强上合组织的开放性,以“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参与”的原则设置近中远期目标,明确不同阶段扩员对象,为实现跨地区稳定和协同发展做好规划。落实共同发展观,与时俱进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使亚投行作为国际金融新机制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其思路应是以联合多边倡议为方向、以最佳实践和沟通协调机制为抓手、以弥补发展中地区巨额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为方式,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帮助“全球南方”摆脱国际资本依赖。

在全球关系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抓手,^⑥以发展中大国为支点,以整体机制建设为路径,创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推动“全球南方”联合发展。要凝聚理念共识,让其他南方国家认识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是确保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证。要引领秩序重塑,挖掘共同兴趣点与契合点,充分发挥发展中大国在处理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中的地缘政治价值,加速“全球南方”塑造世界新秩序和治理新架构的步伐。要做好制度创新,从程序正当性、功能正当性、价值正当性三个维度为全球和地区制度构建提出中国方案。程序正当性意味着在制度设计之初就规划好有效的问责与反馈机制,使其在运行时能高效发挥职能。功能正当

性意味着为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提供可持续的、高度开放、免费共享、具有比较优势的公共产品。完善公共产品的供应层次,促进政治、经济、安全、思想、人文等不同类别的公共产品在不同国家地区的组合,丰富全球选择。价值正当性意味着充分考虑广大欠发达国家尤其关照弱小国家的诉求,使中国倡议和中国行动具有充分的道义价值,从而夯实国际认同基础。

五、结语

“全球南方”的崛起深刻影响着当代世界格局,赋予国际关系新内涵。在此背景下,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呈现更积极主动的姿态,与中国的关系从单向支持转变为双向输出,目标也从反对西方主导的政治诉求,转向以务实发展实现联合自强的更为中性的经济诉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从角色塑造、理念创造、模式构造、主体关照等维度不断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强化合作韧性,为共同发展构筑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双方关系面临诸多挑战。对相关问题的梳理、总结,并拿出有效应对举措,是化解“全球南方”对中国身份的顾虑、巩固中国崛起战略依托的需要,是明确中国外交战略重点、推动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的需要,是解决全球问题、补强全球治理体系中“南方”短板的需要。

面向未来,中国需要继续以“全球南方”成员身份承担国际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同时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凝聚“全球南方”合力,促进“全球南方”联合与共同发展。丰富和完善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理论,推动中国倡议与时俱进。在具体实践中,中国需进一步丰富“全球南方”多边交流平台,围绕数字经济、网络空间治理等新兴领域加强合作,明晰共同治理规范;扩大现有合作机制的影响力,探索不同机制间协调对接的可能性,增

强“全球南方”在不同领域和层面的相互支持与合作,推动实现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共商共建共享。

注释:

①钟飞腾:《中国的身份定位与构建发展中国家新型关系》,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2期,第23-28页;刘方平:《中国对外援助70年:历史进程与未来展望》,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2期,第200-207页;罗建波:《中国对外援助模式:理论、经验与世界意义》,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6期,第39-63、156-157页。

②周方银:《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28-42页;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5-25页;刘青建:《合作发展:非洲发展的选择与中非合作的示范效应》,载《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期,第79-87页;江时学:《构建中国与拉美命运共同体路径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30-42页。

③李小云、徐进:《“全球南方”能否成为中国新的战略纵深?》,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第38-46页;郦莉、徐秀丽:《更趋平行的全球卫生治理新图景——“全球南方”的视角》,载《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5期,第53-65页;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64-78页。

④Alfred J. López, Ashok K. Mohapatra, "Introduction: India in a Global Age; Or, the Neoliberal Epiphany," *The Global South*, Vol.2, No.1, Spring, 2008, pp.1-10; Arie M. Kacowicz,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the North-South Divid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9, No.4, Winter 2007, pp.565-580; Jacqueline Peel, Lin Jolene, "Transnational Climate Litig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13, No.4, 2019, pp.679-726; Dena Freeman, "The Global South at the UN: Us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 Re-Vision the Global," *The Global South*, Vol.11, No.2, Fall 2017, pp.71-91; Jochen Kleinschmidt,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the Global South as a Meta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43, No.2, 2018, pp.59-80.

⑤ Carl Oglesby, "Vietnamism has failed. The revolution can only be mauled, not defeated," *Commonweal*, 1969, p.90.

⑥ Samir Amin, "The Battlefields Chosen by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Conditions for an Effective Response from the South," *Kasarinlan: Philippine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Vol.24, No.2, 2009, pp.4-47.

⑦ Brandt Commission, North-South: A Program for Survival, ICIDI Report, London, January 1980.

⑧ Philip McMichael, Heloise Weber,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a Global Perspective*,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008, p.112.

⑨ Margaret L. Andersen, Howard Francis Taylor, *Sociology: Understanding a Diverse Society*,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1998; Anthony Giddens, Simon Griffiths,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Steven Barkan, *Sociology: Understanding and Changing the Social World*,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Publishing, 2011.

⑩ Arif Dirlik, "Global South: Predicament and Promise," *The Global South*, Vol.1, No.1, 2007, pp.12-23.

⑪ Siba Grovogu, "A Revolution Nonetheless: The Global Sout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Global South*, Vol.5, No.1, 2011, pp.175-190.

⑫ Anne Garland Mahler, "Global South", in Eugene O'Brian, eds.,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Literary and Cr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10.

⑬ Hernán Lucena Molero,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Challenges*, Colombia: University of Los Andes, 2021, pp.211-212.

⑭ Alfred J. López, "Introduction: The(Post) Global South," *Global South*, Vol.1, No.1, 2007, pp.1-11.

⑮ Eduardo Gudynas, "Beyond varieties of development: disputes and alternativ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7, No.4, 2016, pp.721-732.

⑯ Ward Warmerdam, Arjan de Haa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19, pp.141-172.

⑰ [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⑱ [美]大卫·哈维著,王钦译:《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⑲ [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廖丽华译:《全球化的悖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0页。

⑳ World Bank Group, 2023.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June 2023.

㉑ 李小云、徐进:《“全球南方”能否成为中国新的战略纵深?》,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第38-46页。

㉒ 王健、任琳等:《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第3-33页。

㉓ 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é, G7 2023 Hiroshima Summit, May 20, 2023.

㉔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3, MSC, February 2023.

㉕ SD Pradhan, "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 Empowering Developing and Underdeveloped Nations," *The Times of India*, January 19, 2023.

㉖ Barry K Gills, "Going South: Capitalist Crisis, Systemic Crisis, Civilisational Crisi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1, No.2, 2010, pp.169-184.

㉗ M.D. Litonjua,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Is the Term Still Meaningful and Useful?"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Vol.31, No.1, 2014, pp.101-127.

㉘ Achin Vanaik,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Stability: Enter the New Quintet and other Emerging Power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4, No.2, 2013, pp.194-213.

㉙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㉚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0页。

㉛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9日,第1版;胡锦涛:《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05年4月23日,第1版。

㉜ 习近平:《勠力同心 携手同行 迈向发展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23年8月25日,第2版。

③张清敏:《二十大以后的中国外交:理解与思考》,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6期,第1-21页。

④曹德军:《论全球公共产品的中国供给模式》,载《战略决策研究》,2019年第3期,第3-29页。

⑤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4-25页。

⑥杨洁篪:《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载《求是》,2018年第15期,第3-6页。

⑦李克强:《在第二十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4日,第4版。

⑧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30日,第2版。

⑨《关于加强中国—东盟共同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2日,第3版。

⑩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11日,第2版。

⑪江时学:《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载《国际论坛》,2019年第2期,第30-35页。

⑫郭树勇、舒伟超:《论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内涵的丰富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1期,第4-28页。

⑬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⑭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第2版。

⑮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报告,2023年5月18日。

⑯Sriparna Pathak, "China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existing world order," Hindustan Times, February 9, 2023.

⑰Antonio Ortiz Mena, "Mexico in the WTO Debate," FES Briefing Papers, May 2013.

⑱Laura Silver, Kat Devlin, Christine Hua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stly Welcomed in Emerging Markets, but Neighbors Wary of Its Influence,"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9/12/05/chinas-economic-growth-mostly-welcomed-in-emerging-markets-but-neighbors-wary-of-its-influence/>, 登录时间:2023年11月8日。

⑲林民旺:《大变局下印度外交战略:目标定位与调整方

向》,载《当代世界》2021年第4期,第24-29页。

⑳Andrew F. Cooper, "Between Rewards and Risks: India as Host of the 2023 G20 Summit," India Quarterly, Vol.79, No.4, 2023, pp.476-487.

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外交70年课题组:《中国外交70年专家谈(之二)——周边关系和发展中国家外交》,载《国际展望》,2019年第4期,第1-22页。

㉒叶海林:《身份认知偏差对中印关系前景的影响》,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3期,第1-12页。

㉓楼春豪:《印度对华政策的转变与中国的政策反思》,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1期,第26-34页。

㉔贺双荣:《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必要性、可能性及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4期,第1-22页。

㉕门洪华:《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统一战线——一项战略研究议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第4-27页。

㉖孙吉胜:《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2期,第4-31页。

㉗韩爱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周边外交的策略选择》,载《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2期,第78-89页。

㉘周玉渊:《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3期,第3-25页。

㉙刘中民:《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及应对》,载《国际观察》,2018年第2期,第36-50页。

㉚丁俊、朱琳:《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机制、成就与意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3期,第26-48页。

㉛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载《国际展望》,2017年第2期,第22-39页。

㉜唐志超:《秩序、意识形态和模式之转换——中东剧变以来的地区政治发展》,载《西亚非洲》,2020年第5期,第42-58页。

㉝张春:《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研究》,载《国际展望》,2018年第5期,第18-35页。

㉞石源华、肖阳:《中国周边形势新特点与周边外交新思考》,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8期,第13-17页。

㉟张蕴岭:《新形势下推动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载《当代世界》,2021年第7期,第52-56页。

㊱贺文萍:《在抗疫合作中建设更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7期，第22-27页。

⑦王慧芝：《中国—拉共体论坛：进展、挑战及优化路径》，载《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6期，第64-74页。

⑧周玉渊：《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3期，第3-25页。

⑨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第2版。

⑩参见《王毅出席第十三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载《人民日报》，2023年7月26日，第2版。

⑪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2版。

⑫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载《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2版。

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

作》，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7日，第6版。

⑭孙德刚：《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机制构建与发展前景》，载《当代世界》，2023年第1期，第46-52页。

⑮张凡：《拉美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拉整体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5期，第37-55页。

⑯江时学：《构建中国与拉美命运共同体路径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30-42页。

⑰ Leslie Elliott Armijo, Cynthia Roberts, "The Emerging Powe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Why the BRICS Matter", in Robert E. Looney, eds., *Handbook of Emerging Econom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3-24.

⑱韩璐：《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合作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7期，第67-84页。

⑲门洪华：《构建面向未来的中国外交战略新布局》，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第43-50页。

China's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Countries in the New Era: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South

Men Honghua Yu Yanfang

Abstract: The Global South is becom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independent political stance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rationally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South on the repositioning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New Era, and to make adjustments on its foreign policy accordingly.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functions as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its key position should be therefore highlighted in diplomatic strategy.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ticking to its identity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been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progress of its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the guida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new-typ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through building global partnership networks, expanding individual emotional identities, actively establishing cooperation platforms and reshaping global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Global South's fragility and its internal competition, as well as the Western countries' efforts to court and polarize it, have posed many challenges to China's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as a major developing country, continue to lead the cooperation within the Global South and implement China's pertinent initiatives accordingly. Meanwhile, it's conducive for China to integrate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layouts, to build up a point-to-surface, aggregate-to-network mechanism and regime, and to form a composite cooperative structure including politics, economy, security and culture,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foundation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the Global South; Developing Country; Major-Power Responsibility; Concept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